

哀惜金庸

(外两篇)

王蒙

战士执勤时不可以接待亲友，不能闲话，这有什么可哭鼻子的吗？护士在打针，医生在操刀，民航人员在天空，厨子在炒菜，节目主持人录像，老师与学生上课，能同时招待爸爸妈妈吗？这里哪儿来的泪点？

这位老爹看到自己的儿子雄赳赳、气昂昂地在天安门广场护卫国旗，他感到难道不是自豪与快乐，而是不能与儿子说家长里短的悲痛？

老爹有只看儿子几秒或几分钟的日程规矩吗？他多看看等到儿子下班再话话桑麻、说说娘亲不可能吗？

电视节目里有人性的东西，有点催人泪下的内容，当然是可以的，把制造泪点闹成提高收视率的方法，不是有点烦人呢？

感情情感，不可无，不可滥，不可不努力制造。情感云云，也不能停留在泪点上，可以哭，可以亢奋，可以沉思，可以严峻，也可以坚忍与强硬。

希望不再在电视屏幕上看到挤嘉宾与观众的眼睛的拙劣与不通。

初中生与博士生

我不止一次地受到厚爱，被邀约到视频或音频的传播节目中作主讲嘉宾。

我屡次被提醒被灌输的要点是：“请不要忘记，我们的受众只有初中程度，您讲深了，讲绕了，讲得太新奇生疏了，不会有几个人听得进去，听得明明白白，收视或者收听率上不去，我们的节目也就失败了。”

好的，好的，被认为能讲点什么的人，应该努力做到雅俗共赏，应该学习祖国四大名著深入浅出，覆盖万众千年，应该首先考虑人民中的大多数。针对适合义务教育九年接受者的水平，满足他们的需要。

但是我们是不是也还要考虑整个文化传播的生态。除了大量的初中生以外，是不是也可以考虑一下高中生、高校本科生与毕业生、硕士、博士、博士后还有专家学人呢？

设想一下，如果我们的传媒每天传播的信息是100，我们可不可以希望它将其中的85设计为主要针对初中生的节目，而其中的13可不可以是主要针对初中教育程度以上的人的节目，最后的2是针对博士、博士后、专家、学人的节目呢？85%以上节目争取最高的收视率，但那2%的节目，不过于考虑其收视率，而是强调它们的文化内涵，创造性内涵，探索性内涵，高端性内涵呢？

而且，整体看来，我们的传播水平我们的视频音频内容应该是且战且进，且传且升，且走且前进的。是不是呢？

泪点之惑

那天看一个享誉全国的电视节目，其中有一段是表现天安门国旗护卫队的，光明豪迈，响遏行云。这时荧屏上话锋一转，说是护卫队的解放军战士离家乡几百里地，有些时间没有回家了，一次老爹从家乡来到北京，亲眼看到正在执勤护国旗的儿子，但儿子不能与老人家拉呱，如此这般，终于在经验丰富、形象美好的节目主持人启发下，战士哽咽，观众感动起来。

我知道电视人的行话，管这样的节目节点称作“泪点”。我见过导演、责编的书面计划，何处有泪点，有笑点，有什么什么点，都写得很清楚。不免困惑，即产生疑点：

“文汇报”
微信二维码

音乐人文笔录

看伯恩斯坦讲音乐

杨燕迪

的常备核心曲目，而他自己曾录制过三套马勒交响曲全集（包括一套完整的马勒交响曲录像）。他还是具有职业水准的优秀钢琴家，不时登台作为独奏家演奏钢琴协奏曲。而且，他的钢琴演奏能力也反过来帮助和促进了他的作曲视奏、指挥读谱，以及——他的音乐讲演。

据说，当今美国的老一代乐迷中很多人都是因受到伯恩斯坦的感召而坠入古典音乐的爱的河。而伯氏感召力之所以巨大，是因为他敏感地抓住了时代的脉搏，通过“电视”这种当时的“新媒体”来进行音乐普及——电视作为公共媒体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尚处在发育和成长期，而伯恩斯坦一定是相中了这种兼具“顺风耳”和“千里眼”功能的强势媒介，并举成就了他在电视上讲解音乐的“明星”风范。

1954年至1958年，伯氏一口气推出多部音乐讲解专题电视片，一炮打红，引起业界高度关注，赢得好评无数。当年的伯恩斯坦风华正茂，相貌英俊和举止之潇洒，直逼当红的“明星范儿”，而得益于指挥台上的实践磨练，他在镜头面前侃侃而谈、挥洒自如，一定迷倒无数“帅哥”“靓女”。与他的英俊外貌和潇洒谈吐相得益彰，这些专题片具备扎实的内容和崭新的视角——《贝多芬第五交响曲的诞生》《爵士乐的世界》《指挥的艺术》《美国的音乐世界》《现代音乐

近读录

学者书札近年已成为拍卖与收藏的新宠。个中原因，除了写者的学术声望提升了其价值，信函相对的私密性，也使读者可从中获得更多、更真切的信息。这样说，并非鼓励窥人隐私，实在是因为只比日记记下一等，书信乃了解作者内心世界更为可靠的史料。当然，前提还要看与收信人的交谊如何，由此决定了写书人笔下文字的深浅。

天光云影楼主人孙文光先生是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的著名教授，先后担任过《安徽师范大学学报》副主编、安徽大图书馆馆长。长期在芜湖任教、工作的经历，使他在安徽学界广为人缘。而1960年代到北大读研究生的经历，又让他和北大为中心的京城学界建立了密切联系。他将自己多年收藏的93位师友书札以“尺素风谊”命名，结集出版，既是对个人交往史的一次总结，更为学界保留了一份难得的史料。

书信乃是缘于空间距离而出现。在上个世纪网络尚未发明的时代，尺素传书仍是相隔两地的人们最常使用的交往方式。反而是关系最近的身边的亲友和师长，很少留下信札。我的一大憾事就是，因为一直追随左右，我只收到过一封季镇准先生的来信，那还是因为1994年我在日本访学半年所得。相比同样受教于季先生的孙文光师兄至少藏有导师的23通书翰，我的艳羡可想而知。

文光师兄长年担任中国现代文学学会常务理事，尤以龚自珍研究名家，《尺素风谊》所收书札因此多与近代文学、尤其是龚学相关，并集注于一“会”一

那一代学者的风貌

——读《尺素风谊——天光云影楼师友书札》

夏晓虹

“书”。“会”指1985年10月在芜湖召开的“龚自珍诗文学学术讨论会”，乃是由文光兄发起，北大中文系也受邀成为合办单位；“书”为1995年由黄山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代文学大辞典》，文光兄任主编，从筹划、拟目到催稿、成书，均一力承担。前会举办时，我刚刚研究生毕业一年，学术尚未上路；后书蒙主编分派，拟写过“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梁启超”等条目，由此也略知这册厚达一千三百多页的辞典成书之不易。

读有关信札，最令人感佩的是前辈学者的做事认真。《中国近代文学大辞典》卷首列出了五位顾问，即王季思、任访秋、季镇准、顾廷龙、唐圭璋。与今日各书的“顾问”多半只是挂名而已，这些当年寿登耄耋、名重学林的耆宿，却是字斟句酌地撰稿和审稿。81岁的任访秋先生受托撰写“中国近代散文”辞条，自述“当勉力为之”，并详告：“我曾应上海图书公司（邀）参加《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编选工作，由我负责散文选部分。所撰《导言》已发表。拟就《导言》内容，概括成文。写成后，当寄上。”同时承诺，“审阅稿件，届时当一并奉上”（1990年8月9日函），明确表现出一种负责任的态度。

1906年出生的王起（季思）先生更是尽职尽责。委撰条目，则谦称“准备就《霜笛曲录》试写一条”；完成后，又客气地接连使用“草就”“附去”“不知可用否”（1990年8月8日、1991年2月13日函）等说法，并不视

为不可改动的大家手笔。遵照审阅原则——“望编审时能严格掌握，勿急于求成”，而提出总体意见：“各篇样稿都写得扎实。但书出众手，水平参差，文风亦难于一致，望加强通审工作，不必急于求成。”并且，细节也未放过，故“有些零星意见，已于样稿批注”（1990年8月8日、1991年8月12日函），实为“严格掌握”亲身示范。

就中，用力最多的顾问还属季镇准先生。自1992年近代文学学会成立即担任顾问的季先生，早在1958年后，已把更多精力投入近代文学研究，于此一领域拓荒、耕耘，影响卓著。文光兄请季师担任顾问并为《中国近代文学大辞典》作《序》，本是最适切的选择。而季先生“高兴地接受”，也意在“表示我对此事的支持和赞赏”（1989年8月10日函）。这一支持的力度，在辞典中最吃重的“近代文学”条目的撰写上清晰呈现出来。由于主稿者需要有总揽全局的魄力与眼光，也实非季先生不办。季师当年已是78岁，年老体衰，却仍奋力为此纲要性的辞条写下五千字。因超出了约定字数，特意函嘱文光兄可“删削”，只是要求“上下联页，各段分量大致相等”（1991年1月10日函）。对学生辈的主编如此尊重，正体现了那一代学者不可企及的精神风度。

亲力亲为之外，季先生也切实履行了顾问的职责。一再叮嘱文光兄：“更望它完美精粹，避免仓卒求成的缺陷。”“要把质量关，切实核对原书、校勘

文字，修饰不明白或多余词句，增补条目的遗漏，务期符合工具书的要求。”（1991年5月15日、1992年1月14日函）此类尚属原则性的指导意见。季师更有高瞻远瞩、涉及全书结构的重大建议。1991年5月1日，文光兄将《中国近代文学大辞典》的目录寄呈求正，季先生阅后，迅速作出回应。15日的复信中说：

……我仍要提点意见，就是加进《少数民族文学》一个栏目，有综述，也有作家、作品条目。加进这个栏目很重要，不必说了。

文光兄心领神会，立刻遵照照办。现在辞典中“近代少数民族文学”一条，即出自北大1955级学生、长期执教于中央民族大学的张菊玲教授之手。由此，一个严重的缺失得到了及时补救。

应该说，季先生对编纂辞典经验丰富。在此之前，由他担任编辑委员会副主任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已于1986年出版。作为其中“近代文学”分支的主编，季先生先已殚精竭虑，亲历了全过程。从给文光兄的信中，也可见其为编纂此书耗费的巨大精力。不算确定体例、分配条目、审读成稿，单是催促撰写，季先生便须不断发函。而即使尊为师长、心中焦虑，那些督促的话仍多半带有劝导的口气：“如其他工作忙，请调协一下，赶趁此任务，企望之至。”“请你务必排除其它手头工作，陆续写好所承担的条目。这是无法摆开的一个沉重的包袱，早日用功完成任务早好。此后工作多得很，不要让这个包袱背着，无法进行其他工作。”（未记年，6月8日、2月21日函）这些被温情包裹的“务必”，当然会让学生尽力做事时更觉暖心。

我曾经感叹季镇准先生为集体项目付出的时间与精力太多，以致影响了个人的研究。即如大百科的“中国文学”卷，按照我的统计，季先生认领并完成的任务多达17则，包括了《龚自珍》《近代散文》《近代文学》《近代文学史料》《康有为》《梁启超》《刘师培》《湘乡派》《曾国藩》以及八种期刊。季先生当然会看重辞典所具有的历史定论意义，催稿时，也会提示：“新意见并不不要，而要扎实的事实，准确无误的事业，而以简练语言表达之。”如此才可以经久不刊。这些道理都很容易领会。不过，对我而言，读这批信札更有意味的发现，是真正懂得了季先生的内心。他劝说文光兄尽快完稿，竟然是以“共同完成一个吃苦而难讨好的任务”（未记年，2月21日）相勉励。无论编纂者如何用心，求全责备原是辞典逃不脱的宿命。我因此窥见了季先生忠厚诚信背后的明通，体会到几分“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悲壮。

通览《尺素风谊》，亦可以感受到北大同学的友谊绵长。实际上，细检文光兄通讯的师友，北大研究生同学无疑是在交往最深入的一群，所作书信也最好看。仅举一事：1980年，吴组缃先生应邵绍虞先生之约，6月初要去上海讲学一周。南师大的李灵年闻知，即想邀吴先生过宁，为南大、南师和江苏作协开讲。孙玉石将此意转达，吴先生很高兴。孙又探知吴先生“生在安徽，却未去过黄山，很想去”，但碍于“学校经费卡得紧”，迄未遂愿。孙玉石因此写信给文光兄，希望他仿照李灵年的做法，“请吴先生去讲，顺便也就看看风景了”（1980年5月28日函）。而二孙和李以及张菊玲（孙玉石夫人），均为北大中文系1960级研究生，李与张且直接受教于吴先生。导师有意，弟子自当倾力助成。此行吴先生由南京至芜湖，终于上了黄山，了却一桩心愿。

这样一件今日看来稀松平常的小事，当日做却却是异常艰难。文光兄如何接待、陪同、支付酬金，他是当事人，未便诉说。但从李灵年信中所言，“大吴先生到皖，把您累得不轻，他心满意足，但学生办来实在不易”，亦可见一二。而此番感慨，原本出于李氏的切身体验。向孙文光打听“不知你们如何付讲课金的”，乃是因李“与南大几经周折”，才各付了20元。应该是感觉实在拿不出手，李灵年汇款后“也不曾写信去”，并还在为“不知先生如何想法”惴惴不安。由此也不难明了，当得知小吴先生（吴小如）将接踵而来，“拟秋后到其皖南小几处休息时，返京时想走芜湖、南京，并希望‘沿途卖唱’，‘以节省路费’”，其时李灵年的为难。“这些事真难办”（1980年7月26日函）的慨叹，并不表示学生对老师的薄情，实在是当年大学校园里的困境状况令人酸楚。

如今说来，这些都算是珍贵的学界掌故了。而在欣赏诸位师长的笔墨之际，得以领略上一代学者的风貌，是我读《尺素风谊》最受益处。唯一不安的是，承蒙文光兄抬举，本人与夫君亦同附骥尾。因而有必要提醒此文与此书的读者，只需将我们两个“50后”除去，其他都名副其实了。

2018年9月25日
写于沪乐斋

2018年10月7日于
京西圆明园花园



笔会

冲浪

(布面丙烯)

弗朗西斯科·冈萨雷

选自2018上海艺博会

（Charles Ives, 1874-1954）的名曲《未被回答的问题》作为总标题，借助世界闻名的语言学家乔姆斯基（Noam Chomsky, 1928—）的“生成转换”语法理论，探讨音乐语言的构成与转化，音乐隐喻对音乐意义的贡献，调性音乐的未来，以及现代音乐的前途。在这里，伯氏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普及者，而一变成为深邃的思想者和大胆的探险家，他滔滔不绝的口才，游刃有余的示范演奏，以及率性随意的潇洒举止依然如故，此外还平添了人到中年后的成熟、沉稳和儒雅——“明星范儿”兴许少了一些，此时的他或更像一位智者与哲人……

《未被回答的问题》的讲演稿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在1976年正式出版，随即引发了音乐界的诸多争议、辩论和思考。我一直觉得，伯氏除作曲和指挥之外的惊人多方面才华与遗产（包括他在音乐讲演上的卓越成就）尚未得到足够的关注和评估。当然，很少有人具备伯氏那样的出众禀赋。而他在如何使用语言讲解音乐这一课题上，一直给我很多启发与例示。有点可惜的是，他生得稍微早了一些：当时的电视拍摄和音视频录制还原技术还没能发展到足以捕捉他讲演所有魅力的程度。猜想一下，伯氏如果活在今日，他会如何利用和开掘这个“多媒体”“全媒体”乃至“互联网加”的时代？他会青睐和参与当下正方兴未艾的“音频课”和“视频课”吗？——说到这里顺便提一句，我个人刚刚尝鲜试水，制作了一门短音频音乐普及课程《人生必听的十大交响曲》：在我用口头语言为想象的乐迷讲解交响曲名作时，我的脑海里其实总是浮现出伯恩斯坦的榜样——所谓“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